



【香港商報訊】在圓桌會議上，關於中國經濟下行風險的討論，國家發改委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王建指出，認清經濟增長率不在8%以上有很重要的意義，因為經濟增長率從去年一季度9.7%和去年四季度的8.9%下跌到7.5%以下，即使不是暴跌也是急跌。這說明中國經濟增長的內部已經出現了大問題，從宏觀調控政策的轉向來看，已經不能等了。因為再等下去，經濟的內生性收縮就會發展到更嚴重的程度。

發改委：宏調轉型 不能再等

短期難以築底

產能過剩問題最大

反彈乏力

在PMI數據的爭議上，3月份工業速度從前兩月的11.4%反彈到11.9%，官方的PMI值也顯著回升，許多人由此認為，中國經濟下行過程已見底，自二季度應開始走高，這樣的觀點並未獲得王建的贊同。他指出，3月份的反彈只說明經濟下行曲線不是直線而是折線，而折線方向是震盪下行，不是震盪上行。

危機至少延續十年

中國經濟下行，王建判斷為連續三年。王建表示，判斷的背景是生產過剩與外需緊縮，且沒有進行大的結構調整，中國經濟將因此而調頭下行。實際上，這個階段應始於2007年三季度。從那個時候算起，中國經濟進入下行階段已經近五年了。

王建分析稱，現在仍有許多人抱有侥幸心理，以為發達國家會很快走出危機，中國就可以不用轉向內需而進行大調整、大改革了。現在已可以看出，發達國家的這場危機至少十年內走不出來，所以拖延調整與改革只能使中國經濟走上爆發危機的道路。他稱，一季度8.1%的經濟增長率應該考慮間年的影響，如統計公報中所說，今年一季度的經濟增長率是1.8%，則折年率只有7.4%。也就是說，如果今年後三個季度中國經濟增長率無新的推動因素，全年的經濟增長率就會低於7.5%這個年度目標。

王建強調，認清經濟增長率不在8%以上有重要意義，因為經濟增長率從去年一季度9.7%和去年四季度的8.9%下跌到7.5%以下，即使不是暴跌也是急跌，這說明在中國經濟增長的內部已經出現了大問題，從宏觀調控政策的轉向來看，已經不能等了，因為再等下去經濟的內生性收縮就會發展到更嚴重的程度。

重工業回升乏力

王建表示，產能過剩是壓抑投資需求下降的本質原因。從已公布的數據可看出，工業

速度的回升主要是輕工業的回升，重工業回升速度並不明顯。從用電量看，前兩月重工業用電量增長率是6.6%，而3月當月的增長率只有1.6%，下降了5個百分點。說明重工業的增長動力並不再顯著趨強，反在趨弱。由於重工業增加值佔全部工業產出70%以上，也佔全部GDP30%，如重工業無顯著反彈，認為中國經濟已經築底回升是沒有根據的。

王建直言，中國目前的大問題是產能全面過剩，即不僅有製造業的產能過剩，也有基礎產業的產能過剩；不僅有面向國內的產能過剩，更有面向外需的產能過剩，這是壓抑投資需求不斷下降的本質原因。因此，不解決嚴重產能過剩的出路問題，投資需求是不可能再出現高增長的，這就使經濟增長難以從下滑過程中真正反彈。



國家發改委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王建



缺乏戰略

中企留洋四大挑戰

與此同時，王志樂更分析指出了，中國跨國公司邁向全球經營，面臨的四大挑戰。

首先，缺乏適應全球化發展的投資戰略。根據《2011年世界投資報告》數據顯示，進入世界最大的100家非金融類跨國公司排名的跨國指數平均值約60%。進入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排名的100家公司的跨國指數平均值高達52.1%。中國9家跨國公司入榜，他們的跨國指數平均值是24.5%。著名的中石油的跨國指數還不到3%。這些數據說明，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產、全球市場份額佔有和全球人才使用等方面，中國公司與其他全球公司的差距巨大。中國企業跨國指數低的根本原因在於缺乏清晰、長遠的全球經營戰略和全球配置資源的能力。

其次，缺乏適應全球化經營的管治結構。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公司的發展，跨國公司股權結構出現了變化，國際持股比例不斷攀升。在企業治理結構方面，很多建立了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化的董事會。在管理結構方面，不少全球公司已從中心輻射式管理調整到全球網絡式管理。中國跨國公司基本上還是以母國為中心輻射若干國家子公司的中心輻射式的管理，很難適應當今世界高度複雜的經濟環境和快速變化的市場環境。

其三，缺乏適應全球化發展的責任理論。進入新世紀以來，全球企業強化負責任的商業行為。但有的中國海外上市企業因財務賬目作假而被迫停牌或退市，有的企業涉嫌通過賄賂獲得訂單而被世界銀行列入黑名單，有的因企業安全事故或環保問題而被當地民眾批評等現象。

最後，缺乏在高風險地區進行投資的風險管治經驗。2012年1月27日中水電29名員工被蘇丹反政府武裝劫持，僅僅4天後又有25名中國員工被埃及部落武裝劫持。甚至一些重大的海外水電投資項目——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在緬甸的密松大壩項目由於緬甸內部政治形勢變化而在2011年9月底被暫停建設。

王志樂直言，中國企業面臨上述這些問題多數是因為缺乏對外投資經驗所致。中國企業真正大規模對外投資始於入世10年，在這麼短的時間裏開始了如此大規模的對外投資，出現這樣那樣的困難並不奇怪。當務之急是，如何正視面臨的挑戰，借鑒國際跨國公司的經驗和中國其他企業的經驗，創新對外投資的理論與實踐。

中企陷入四鈹短板

- 缺乏適應全球化發展的投資戰略
- 缺乏適應全球化經營的管治結構
- 缺乏適應全球化發展的責任理論
- 缺乏適應高風險投資的管治經驗

外需萎縮影響持續

將是一個長期化的因素，這也決定了中國經濟不可能短期內見底。

王建指出，今年一季度經濟增長中的一個新現象是消費需求成了主角，在當季增長率的貢獻份額中高達77%，而過去十年的平均值只有42%。但如果沒有經濟的高增長與分配關係的重大調整和改善，是很難解釋城鄉居民收入這種突然性高增長的，那就只能用短期的、臨時的甚至是非經濟的因素去解釋。若真如此，則由居民高收入為支持的高消費需求增長，並由此帶來的經濟增長就不可能是持久的。

CPI 未季或「破五」

關於CPI上升是需求回升的證明，王建同樣無法認同。他指出，自新世紀以來，中國通脹性質的顯著變化和新特徵，就是已不直接與貨幣的鬆緊相關，而與輸入性因素和成本性因素相關性更強。從一季度的消費物價上漲結構看，總物價水平上漲3.8%，食品物價上漲8.0%，食品價格上漲幅度仍是總物價上漲幅度的一倍以上。主要由食品價格上漲推動總物價上漲的情況已有十年，而若是因銀根放鬆或總體需求擴張所帶來的通脹，就不會有如此強烈的結構性特徵。

推進城市化突破口

由於生產過剩而難以增加投資需求，產生這個矛盾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的城鄉結構失調，因此王建建議，通過調整城鄉結構，推進大規模城市化進程就可釋放出巨大內需，城市化是目前的突破口。

王建建議，對現有城市的空間結構改造、對城市群的交通網絡重新布局和改造，以及圍繞大型都市圈的建設而高鐵路建設與現代物體體系建設，都需要進行大規模的投資。而農民的市民化也可以釋放出巨大的消費需求。此外，市場蕭條會引起企業的技術更新熱潮，這些方面都會形成未來新的投資增長點。但前提條件是，中國必須進行根本性的調整和改革。

外需萎縮

在全球經濟依舊低迷之際，王建認為外需的萎縮同樣決定了中國經濟短期內無法見底。

王建表示，3月份出口增長率是8.9%，比前兩月的6.9%有所提高。但是出口增長率按現價美元計算，這就有價格和匯率因素。今年3月人民幣匯率同比升值4%，出口價格指數也有7%的漲幅。扣掉這兩個因素，3月出口實際增長率是-2%，一季度則是-3%。所以外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負面效應仍在持續。外需的萎縮主要來自歐盟，前兩月中國對歐盟出口是-1.1%，3月當月已擴展到-3.1%。從未來看，歐債危機與美國的次債危機都遠未結束，因外需萎縮而形成的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壓抑，

全球資源整合共享

資源共享

(上接A1版)北京新世紀跨國公司研究所所長王志樂認為，歷史上一個大國崛起的時候，本國資源都不足以支撐其發展，都需要吸納國際資源。與此同時，中國跨國公司亦不得不從跨國經營一步邁向全球經營。

王志樂舉例說明，2010年中國進口2.39億噸原油、6億噸鐵礦石、400多萬噸銅、5000多萬噸大豆。僅大豆而言，以一畝地產300斤大豆計，進口5000多萬噸大豆需要3.5億畝土地。

他表示，全球化時代，必須融入全球市場體系，利用好全球資源。與歷史上崛起的西方大國不同，中國通過市場競爭的管道吸納和整合國際資源，有助於中國實現和平崛起。

公平對待跨國公司

王志樂認為，中國加入世貿後，跨國公司與中國企業和中國經濟的矛盾衝突加劇，融合中的磨合以及合作中的競爭凸顯出來。對跨國公

司在中國的作用也出現了日益增多的批評，擔心外資併購影響國家安全、質疑跨國公司損害中國企業自主創新、批評跨國公司損害中國企業品牌發展以及否認跨國公司在華企業是中國企業等。其中焦點是外資企業「姓中姓外」的問題，一度出現排斥、抵制、懷疑外資的情緒，特別是以2006年雷凱收購徐工事件為標誌，達到高峰。

王志樂表示，在反調查中顯示，22個併購案中沒有一個案例真正影響國家安全。受此影響，22個併購案件都被否。排斥浪潮，使擬被併購的中國企業失去了引進全球先進技術的機會，也使中國企業失去了在自己身邊學習跨國併購的機會。他甚至認為，目前全球經濟形勢不明朗，對中國吸引外資是一個機遇。

北京新世紀跨國公司研究所所長王志樂



繩子理論

放鬆銀根非救市法寶

放鬆銀根就能拉動經濟反彈?王建同樣存疑。他指出，今年一季度銀行未貼現承兌匯票同比少增5430億元，其中逾50%出現在3月。銀行資金需求在減弱還可從企業票據貼現需求顯著下降看出。承兌匯票比貸款更貼近企業現實經營活動。因此承兌匯票貼現需求減少，更說明企業因經營活動趨弱而減少對銀行資金的需求。

由於經濟下滑，許多人目前把反彈的希望寄託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從反通脹轉向保增長而放鬆銀根上面。王建分析稱，這個指望不無道理，但是貨幣供給終究是「中間需求」，而投資、消費、出口才是最終需求。當最終需求沒有實質增加的時候放鬆銀根，央行雖然願增加貸款供給，但卻有個企業願不願要的問題。若企業面對一個逐漸萎縮的市場，就不會主動擴大生產經營活動，因此就不會增加貸款需求。這就是西方宏觀經濟學中所說的「央行只能拉緊繩子而不能推動繩子」。給不給貨幣是央行主動，要不要貨幣卻是企業主動，所以對宏觀緊縮政策而言是貨幣政策更有力，對宏觀刺激政策而言則是財政政策更有力。

王建表示，從實際情況看，3月份的貨幣增長率反彈出乎所有人預料。一般來說，貨幣增長率高於現價的GDP增長率就意味着增長的貨幣條件比較寬鬆。去年全年貨幣增長率比現價GDP增長率低3.8個百分點，而今年一季度則高2.1個百分點，3月份的貸款增長也超過萬億元。這說明貨幣條件已轉向寬鬆，但是經濟增長卻仍未改已持續了4個季度的下滑趨勢，反而在加速下滑。這更說明，經濟的下滑絕不僅僅是出於去年貨幣條件過緊這個外生原因，而是出於生產過剩這個內生性原因。